

ZHONG GUO JIN DAI SHI YAN JI RU MEN

# 中国近代史

# 研究入门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林增平 林言椒 主编



YJRM

中国近代史

ZHONGGUOJINDAI SHI YANJIURU MEN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研究入门

林增平 林言椒 主编

本书编写组 李喜所 林言椒  
林增平 潘振平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林增平 主 编  
林言椒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 开本21.625印张532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15-00869-x/K·188

定价12.55元

## 绪 论

按我国史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919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为止，约八十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段史事。其上限，即与中国古代史的界限，断于1840年，是因为这一年英国资本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抵抗失败，被迫与英国侵略者订立了《中英江宁（南京）条约》，从而使美、法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跟踪效尤，相率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紧随英国之后，进入中国逐步开展殖民主义的掠夺活动。由此伊始，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变化，即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其下限断于1919年，是因为经过新文化运动，随即又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历史进程具有与前此不同的特点。故史学界通常又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的交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1840）和下限（1919）基本上确定下来。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明确规定，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专业课程，讲授的范围是1840——1919年。中等学校历史课，中国近代史也作为一学期课程安排。

在国外，对中国近代史上限、下限的理解，颇不一致。

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较多地同意我国史学界的见

解。比如，近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两本史学论著，一是已故信州大学教授永井算已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上起太平天国，下至辛亥革命，书名为《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一是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为悼念福岛大学教授菊池贵晴，辑日本史学界撰写的论文（其中有一篇为中国学者汤志钧的文章）为一集，因撰稿者论述范围涉及鸦片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期间的史事，故书名为《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这表明日本学术界一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界限是明确的。又如，由野泽丰、田中正俊主编的七卷本《中国近现代史讲座》，小岛晋治、丸山松幸合著的《中国近现代史》，也是起自鸦片战争，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主要是对近代、现代的含义理解不一致，或对近现代的界限有不同的看法。

在国外，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和人员为世界各国之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收录1949—1978年国外刊行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三千多种书目中，美国的占半数以上。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不少美国学者同我国史学界的见解大相径庭，主要是对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颇多异议。有代表性的是密执安大学历史系教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他在一篇题为《穿着马克思主义服装的中国史学》的文章中写道：“如果‘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史的关键，那末历史就有完全丧失其自主性，从而失去其意义的危险。”又称：“在中国近代史的结构中给外国入侵派上这么大的作用，这几乎是抛弃历史能够自动发展的信念”，“引起人们怀疑自己过去的价值。”这里，费维恺认为我们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并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就是否认中国历史的自动发展，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外因论。而按他们的看法，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应从西欧开始进入近代社会的十六、七世纪算起。必须指出，无论从事实还是从理论上

探讨，美国学者这种看法都难于成立。我们认定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以大量确凿无疑的史实，揭示了自从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在持续地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即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并使之成为它们统治和假手掠夺中国的工具。于是，中国就逐渐丧失独立，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以至政治上层建筑都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质变。也就是说，以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为契机，随着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和演变，封建的中国就一步一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看法，系坚持外因是促使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产生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不能够指责为外因论。如果按照费维恺的意见，中国历史应当从属于西欧的分期界标，从十六、七世纪即进入了近代时期；而且，还应当树立“历史能够自动发展的信念”，那末，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起逐步沦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应是历史自动发展的结果，与帝国主义列强多次的、持续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侵略无甚关系。这样，成百年来信而有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历史不是一笔抹煞了吗？<sup>①</sup>

苏联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界限，可以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为例。这部中国近代史，将中国近代的上限提前两个世纪，即以1644年清朝的建立作为中国近代的开始。其所持理由有二：一是说“满洲人征服封建的明朝所统治的中国，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相吻合”，“它的上限和下限是根据世界史发展的规律确定的”。其二是说，中国近代史恰好是“满洲军事封建主

---

<sup>①</sup> 参阅余绳武刘存宽：《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293—305页。

侵入了中国疆界”，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洲人的统治”<sup>①</sup>的历史。这种分法是很不妥当的。第一、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很大的差别，所谓近代史，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及其没落的阶段。1640年英国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第一页，因而一般把这一年作为欧洲近代史的开始；由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嚆矢，所以，1640年泛指为世界近代史的发端，也未尝不可。而1644年，中国虽然发生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的事变，但社会性质并没变化，即仍然属于封建社会时期。讲中国史，则显然不能以此作为由古代进入近代的标志。即使是讲与英国毗邻的法国的历史，也应以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法国近代史的肇端，而不应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轫作准绳，将法国近代史的上限提前到十七世纪的四十年代。所以，认为清朝的取代明朝“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相吻合”，从而把中国历史塞进世界史分期的框架里，截下1644年以后的一段并入近代史的范围，是毫无道理的。其次，满族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们长期休养生息的地区，也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满洲军事封建主侵入了中国疆界”的问题。只是满族的统治者驱军入关，推翻了以明朝皇室贵族为首、主要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明朝，重演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封建王朝嬗替兴废的事变而已。显然，把清朝取代明朝说成是“侵入了中国疆界”，与历史事实不符。所以，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所持关于中国近代上限下限的看法，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起迄是建国初确定的，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近、现代的概念也不能不产生变化。因此，史学界近年遂提出新的分法，其主要理由有二：（1）近代史的上限，是以中国由封

---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编者的话》。

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标志，即基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确定的；而其下限定于1919年，则是从革命性质开始变化的角度来划分的；上、下限划分的标准明显地不一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宣告终结的；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未发生变化。(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转瞬就将四十年，光阴似箭，半个世纪指顾可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空前的变化，足够构成一部翔实丰富的中国现代史。因此，主张中国近代史应延长到1949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应作为现代史的起点。

这种意见，目前虽还没有成为定论，无奈岁月如流，再过若干年，必将为史学界所公认。

## 二

迄今为止国内所有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专著或一般读物，对于近代八十年史事的编排，大体有两种体裁。

一是由范文澜在建国前即已创行，在他的专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一书里采用的体裁。即以近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主干，分为若干章详其始末，叙其因果，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较通行的分法是列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八章。有的分得较小，即将上述八章拆开，将每章中较重要史事或政治、经济的变化，列为章题，全书列十余章，或二十余章不等。这种体裁被称为纪事本末体，其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末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特定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线索，启迪人们全面地去探讨历史前进的规



律。

正是鉴于上述纪事本末体裁所存在的缺陷，1954年，遂由胡绳首倡，在《历史研究》杂志第一期上推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和界限的主张。不少学者相继撰文发表意见，从而形成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尽管当时对分期的标准和界限还存在较大分歧，但这次讨论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应，即推动了1956年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

《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是由邵循正执笔拟订的，经讨论后略有修改。《大纲》大体依据近代八十年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交相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近代人民革命三大高潮——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具体界限是：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9年。《大纲》据此分为三篇，每篇若干章，各篇里适当地纳入了该时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内容。

《大纲》订立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所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讲义，公开出版的少量中国近代史专著，一般都采取了按《大纲》要求，分时期安排篇章论述史事的体裁。这就在形式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纪事本末的格局，也就或多或少增添了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在这前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逐渐活跃起来，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也颇具成绩。较显著的是对建国前受到贬责甚至加以污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及诸如三元里抗英斗争、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各少数民族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起义等人民自发的反抗事件，都曾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批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持论较为公允的论著。1958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界曾撰写了一批有一定质量的论文；全国政协

和有关省、市政协，还曾组织亲身经历过这两次事件的老人撰写回忆录，陆续公开发表。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自1951年出版《义和团》资料起至1961年刊出《洋务运动》资料，共计八种，累计达二千四百余万字；还有其他专题资料汇编、档案资料选辑、国外资料翻译等的络绎面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建国前比较，学术界对近代史的研究不仅有明显的拓宽和加深，更主要是产生了质的变化，即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近代史事进行研究、叙述和编撰的体系。当然，与中国近代史本身广阔丰富的内容及其纷繁复杂的变化来比，研究者所涉及的范围又显得很不够。发表的论著，较集中于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程，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极为不够；这些方面的大部分课题，还可说无人问津。而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思潮漫衍起伏，政治运动的相继开展，史学研究遂大受影响，或多或少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陷入混乱状态。及至“文化大革命”来临，林彪、“四人帮”酿祸谋乱，狂热地鼓吹现代迷信，尤其热衷于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错误理论的工具，打着“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幌子，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以遂其篡党窃国的诡谋。以致历史学的声誉被败坏无余，正常的史学研究完全停顿下来。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史学界迅即对“四人帮”蹂躏史坛，歪曲史事以遂其篡窃野心的阴险手段和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揭露和清算，尽速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活动，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明显的进展。研究者们相继建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义和团运动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并陆续举行有较高水平

的学术讨论会。有较大影响的近代通史新著和专史著作也相继问世。而为研究者所共同感到兴趣的课题，则首推再一次的开展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的讨论。

在讨论中，“文革”前提出的以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线索的提法，仍为一部分学者所赞同，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另一部分学者则基于对洋务运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即认为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微弱的进步。而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主题应是为在中国开辟和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途径。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有的学者并称它为中国近代化的三个阶梯。随后，持此一说的学者又提出补充意见，认为不能否认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冲击封建统治秩序，促进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作用，因而这次农民大起义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阶梯。还有的学者对上述两种见解均持异议，另行提出以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仆后继和多次高涨为基本线索的说法，倡议应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一起串入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之内。从讨论的情况看来，几种意见参商的症结，在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根本的分歧。尽管如此，通过这次讨论，学者们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发展过程，演变体系和涉及到的研究方法等，在切磋中仍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颇多新意，确曾有效地推进了近代史的研究。而当这桩学术争论的公案还远没有了结的时候，有位学者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一文，认为开展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乃是囿于一种所谓“历史的线型发展观”的藩篱而从事的争辩，虽然也有相互启发切磋的意义，但却难以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获得更为显著的扩展和深

入。无论辩论者如何继续精心修饰和完善自己的论点，总归始终摆脱不了“线性发展观”的束缚，从而对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由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过程中纷繁多样的变化和深层潜在的因果关系难于触及。需要指出，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是否属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的一场争辩？这番讨论是否会限制研究者向近代史上更广阔更深层的境界进行探索？当然还值得商榷。但文章作者所提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探索中的缺陷和局促于狭窄范围的弊端，是值得重视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对此早已洞察。他在1980年的《历史学年鉴》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建议学术界寻找一个“突破口”，并强调“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学术界不少人也有同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遂有所加强。随后又渐次开拓近代文化史的钻研和讨论，陆续就中西文化交相冲击，彼此融汇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承袭和扬弃的得失撰文商兑，或相偕探讨近代哲学思想、典章文教、科学技术、文坛艺圃等方面的因革兴废。近年，更提议将无形中圈为禁区、荒芜多年的社会史研究领域重新开放，从速加强近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探讨，分别就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兴革，各阶级、阶层不同的生活情况，社会习俗、宗教、礼仪等方面的变迁，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关系等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开展讨论和研究。一些新的领域，如近代城市发展史、边疆开发史、人口迁移史、区域经济文化史及其比较研究等，也都开始被学者们选定为研究的课题，且已有少量阶段性成果面世。可以预期，这将有效地将近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 三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一样，应当尽可能做到通晓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因为，只有到了伴随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人们借助它的原理的指导，从事理论思维，把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做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并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在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事实的关系称为论与史的关系，因而几度用“寓论于史”、“以论带史”、“论史结合”的提法，琢磨商讨如何确凿妥善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探寻历史事实的真象、实质及其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

应当指出，无论如何确切地阐明论与史的关系，重要的是必须熟练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就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而不能满足于熟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片断摘录。当我们仔细地阅读这几位大师的有关论著时，就能发现，他们对所阐述的特定历史事件，是那样地剖析精微，鞭辟入里；洞察因果，揭示规律又是那样地脉络清晰，顺理成章；评论人物，更属褒贬得当，恰合分寸。可以肯定，切实认真地读几本，就必然会获得这样的感受；也必然确认，学好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切实学好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不能缺少的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指南，不能认为，征引几条理论，就可以取代对历史本身推移变化的具体论述。因此，掌握必备的历史基础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这就要求任何有志于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不仅要熟悉近代范围内中

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掌握一定的资料，还要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有所了解。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古代史的延续，古代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思想，风俗习尚……都在一定期间，一定范围内延续到了近代，先后不同地产生变化。中国近代史的第一章，则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嗣后，欧美各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曾在不同时期或独自，或相互勾结对中国进行武装入侵或外交讹诈、经济掠夺等侵略活动；中外关系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项重要主要内容。不言而喻，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的基础知识，是难于学好中国近代史的。

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只是学好中国近代史的必备条件，而要进行研究，则还必须掌握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大量资料，并具有对资料进行鉴别，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技能，这就是所谓史料的考订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旧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曾经历代师承一种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史料的考证，史学家把史料考证得确凿无疑，就实现了研究的目的。这种旧史学传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一贯强调，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考察史事，探索历史的真象及其规律性。然而，我们也不忽视史料考订的重要性。因为，史料毕竟是我们运用唯物主义去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主要素材。如果史料是未经校勘考证的错误记载，那么，所阐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等，就必然会讹误失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史料经过纠误匡谬后，也不一定会影响对史事本身性质、作用、价值、意义的阐述。比如，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的生年，即有1875年、1877年、1879年三种说法，何者正确，当然应加以考订，但即使采用了错误的生年，也不致影响对秋瑾的评价。然而，有些史料经过辨伪订讹后，则足以纠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评论，使某些特定的历史研究课题获得实

质性的突破。以下，举几个近年在这方面的成果为例。

(1)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穿鼻草约”的问题  
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①

“……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广州隔开。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

这种不实之词，早就有人置疑。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胡思庸、郑永福的《穿鼻草约考略》，以极有说服力的论证，断言：其一，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有香港全岛，只同意寄居香港一隅；其二，所谓《穿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故《穿鼻草约》当时既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从而证实，英国侵略者捏造所谓《穿鼻草约》，乃是为了制造强占香港的口实，以掩饰其恃势攘夺中国领土的殖民主义侵略行径。

(2) 鸦片战后英国强租广州河南和广州人民反河南租地斗争的年代问题

1980年以前三十年期间，先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和有关的年表辞书等，凡提到鸦片战争后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斗争，都肯定事件发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979年，廖伟章、

---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上卷第213—214页。

林增平分别在《学术研究》第二期、《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上撰文考证，事件并非发生于1844年，而是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讹误的原因，是梁廷楠所著《夷氛闻记》的纪述失实，学术界不察，故长期沿袭致误。从表面看来，年代记载谬误，似乎无关宏旨。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是英国资本主义无端起衅的侵略行动，长期误作1844年，则可能界人以口实，讥为无中生有；甚至指控为捏词构陷，致有损于我国学术界的声誉。而且，也不免会导致对前后发生的其他史事的评述产生差错。故1983年《历史学年鉴》发表的一篇《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的文章，认为这一史事发生年代的订正是近年鸦片战争史有明显进展的成果之一。

### （3）关于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改纂问题

多年来，学术界据以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史料，是刊印于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五月的康有为《戊戌奏稿》。1982年，孔祥吉于《晋阳学刊》该年第二期上发表《〈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用他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到的《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康氏奏稿的原件，以及其他未收入《汇录》的奏稿和进呈书原本及序，发现《戊戌奏稿》中各奏章与原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个别奏稿如《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析》，在档案中竟属阙如。从而指出，《戊戌奏稿》是经康氏改纂的，改纂之处比较集中于三点：“其一，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其二、“《奏稿》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其三、“《奏稿》极力掩盖康有为尊崇君权的思想”。作者认为，经改纂的辛亥年刊行的《戊戌奏稿》所反映的大多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辛亥革命前流亡海外时的政治主张。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同康有为保皇党展开论战。康、梁为了回击革命派的笔伐，以求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并藉以敦促清廷尽速推行宪政，故匆匆将《戊戌奏稿》推



出应市。这是改纂《戊戌奏稿》的政治目的。

孔祥吉这一考订和论证，说明使用辛亥年《戊戌奏稿》为依据所进行的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无论是对当时康、梁等人思想认识水平的估计，对所提出来的维新新政奏章条陈所能达到的变革程度的预测，都会与实际情况有或多或少的差距。这就显然难于写出情真事确、信而有征的戊戌变法史。

#### (4) 关于《景善日记》的真伪问题

《景善日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的见闻，原有学者撰文表示置疑。但因建国初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曾将其收录，故似乎又将疑团冲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一般都征引采用。近年，丁名楠发表题为《〈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sup>①</sup>一文，论证了宣称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在景善的住宅发现这份日记的英国汉学家白克浩司(B. Backhouse)，纯系撒谎诬骗。《景善日记》实系白克浩司伪造的。嗣又有胡滨、吴乃华将英国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著的《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爵士的隐蔽生活》译成中文出版<sup>②</sup>。书中揭露白克浩司“在政治上也是一个一贯招摇撞骗、弄虚作假的大骗子。”并从多方面坐实了白克浩司捏造《景善日记》的作伪行径。由于《景善日记》中记述了清廷自西太后至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等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的言论和廷议，多为研究者所引用，而近年则考证它纯属伪造的赝品，这就不能不使研究者感到对义和团若干史事重新进行估量的必要。

此外，如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将藏于曾国藩后人家中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以《李秀成亲供手迹》出版后，过去不少讹传的太平天国史事，有些遂得以澄清。例如，长期以来均将洪秀

<sup>①</sup>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492—504页。

<sup>②</sup> 《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齐鲁书社1976年出版。